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 | 崔延强口主编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引入牛津剑桥： 英式住宿书院 与美国大学

1894
/ 1980

[英] 亚历克斯·杜克 Alex Duke / 著
邓磊 杨甜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

“古典大学生生活史与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CIA1400181)

引入牛津剑桥：
英式住宿书院与美国大学
(1894—1980)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英)亚历克斯·杜克(Alex Duke) 著

邓磊 杨甜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引入牛津剑桥: 英式住宿书院与美国大学: 1894-1980 / (英) 亚历克斯·杜克(Alex Duke) 著; 邓磊, 杨甜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7

(“大学: 思想与制度”书系)

书名原文: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SBN 978-7-5689-0476-6

I. ①引... II. ①亚... ②邓... ③杨...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5724 号

引入牛津剑桥: 英式住宿书院与美国大学 (1894—1980)

(英) 亚历克斯·杜克 Alex Duke 著

邓磊 杨甜 译

策划编辑: 陈曦

责任编辑: 杨敬 周碧雯 版式设计: 陈曦

责任校对: 张红梅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mm×136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80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0476-6 定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大学的生命

近 10 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在“钱学森之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的推波助澜下,风急浪高。有匡复“大学精神”的,有反思“大学理念”的,有编制“大学逻辑”的,不管是收拾大学的历史记忆,还是改造大学的现实制度,归根结底都是意在鞭策今天的大学教育重返“大学之道”。我检索了多数言论,发现了两个盲点:一是抽象普遍的逻辑理由遮蔽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特色寻觅与构筑;二是问题切入的视角是教授专家、高层管理,丢失了大学赖以存在的土壤——学生,而学生立场的“缺席”,使大学之道的讨论显得格外悲凉。

我们的大学是谁的大学? 大学的生命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大学是传道者和问道者不分肤色信仰、不分男女长幼、不计贵贱高低,济济一堂,如切如磋,究天问地,抒发胸臆的共同精神家园。我们师与生是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大学不是纯粹的科研流动站,也不是按统一规格批量生产人才品牌的车间作坊。牛津学者纽曼说,一所大学虽说不是诗人的圣地,但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这所大学缺乏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2001)。不能把大学的使命锁定在单纯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上,如果一所大学的首要和主要任务是研究和专利,那么真的看不出还要学生干什么;如果要招收的只是学徒帮工,何不

把清华、北大更名为“科学院清华分院、北大分院”呢？每当听到“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称呼时，总不免有“汗”的感觉。教书育人、研学相长是大学天经地义的第一要务，而今又造出个“研究型”来，据说是指标体系的。除了“自己争取到科研经费要和政府投入相当”“不断生产高水平学术成果”云云之外，至少研究生的规模和本科生对等了，或远远大于本科生规模，才初具“研究型”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高水平大学严格控制本科生招生，研究生规模则突飞猛进。我们的一流大学都按这样的“研究型”标准操作，不仅研究生的规模膨胀不堪重负，培养质量令人担忧，而且相当一部分优秀生源进不了一流大学读本科，只好漂流到资源欠发达的地方，的确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所说，“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结构”，承担着知识创新与智力输出的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学的“魂”是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教书育人。研究是骨骼和肌肉，教育是灵魂和血液。大学必须根植教育，魂系学生，才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大学，有生命力的大学。

本着这种理解考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大学体制创新也好，改革也罢，出发点不应只是一个与所谓国际水准接轨的“世界眼光”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在经费投入与筹措、知识造血能力与水平、管理理念与体制方面，的确好像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有天壤之别。但问题的关键核心是什么？这些表象“差距”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不能抽象地谈“接轨”，“接轨”不只是一堆数据的比较。我们应着力思考回到大学生生命本源的问题：中国的大学，作为华语世界的大学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世界之林中，找寻我们自己的特色，确立我们自己的位置。特色就是不可比拟、不可通约，就是个性，就是优势，就是生命。没有特色的大学最多是在哈佛之后，再增添一所小哈佛，中国的哈佛而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北大就是北大，

与哈佛没有距离。”的确，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让我想起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从牛津回来的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讲述香港中文大学，作为一所以科学发现和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大学，一所华语世界的大学，怎样从“新亚”和“崇基”两个小小的传统书院起步，顽强地屹立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学之林。那就是在说英语的同时不忘说汉语，以书院精神支撑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的生命何在？一言以蔽之，传统一点就是大学的书院气质，摩登一点就是大学的人文精神。离开了它，大学只剩下一堆数据、表格、指标、文件和证书，无法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落实到大学改革上，一是坚持以学术为本，重塑大学的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体制；二是以学生为本，重建教学设计与管理体制。

立足于大学生命的基点，本丛书意在从大学思想和制度的维度，探索大学延绵八百余年至今不衰的历史之谜与发展之路。

12 世纪文艺复兴以降，大学历经新知识大发现、民族国家兴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全球化等浪潮，曾被质疑为纨绔子弟挥霍之地，一度烛火飘摇，几近泯灭。幸每每于危难之际，其命维新，于今发扬光大。但是思想不是博物馆，它与躯干息息相关。思想与制度构成了大学的灵与肉，互为偎依。

道以为制，制以为新，这是大学的肌体。文以载道，育人为先，这是大学的生命，中国大学的生命。

是为序。

崔延强

2010 年春于嘉陵江畔

书院教育的引进与美国大学的理念焕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学也迎来了“大变革时代”。这一阶段美国大学的显性特征是办学规模的膨胀和现代体制的确立,但实质上更深刻的变化却是理念的更新。19 世纪下半叶,留德美国学者将知识创新引入美国大学。以德式研究型大学为模板,美国大学建立起现代学术体系,完善了教师入职、晋升和考核机制,并以“知识创新”为宗旨,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深刻的内在矛盾。

美国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以服务为导向的大学虽然能够满足工业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但却与民主社会所重视的公民品格相去甚远;其二,对学术创新的重视以及学科知识的细化,不仅削弱了本科教育的地位和质量,而且导致大学文化生活日趋荒芜。对此,以哈佛校长洛厄尔、普林斯顿校长威尔逊以及芝加哥校长哈珀为代表的美国大学领导者展开了反思。他们认为,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大学规模迅速膨胀、专业不断细化、研究备受重视,而大学的根基——本科教育——却逐步受到侵蚀。以“服务社会”为主导的办学模式只能培养能力和思想都非常狭隘的工具性人才,而唯“学术创新”

为尊的评价制度则降低了大学教育的价值，导致美国学生的创造精神和批判意识不断下降。如果想要改变这种机械功利的教育模式，就必须致力于更有效地激励个体发展，更严格地遴选学生以及实施更完善的教学与评价制度。

基于以上认知，美国大学的领导者和改革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高等教育观——“全人教育（educating the whole man）”。“全人教育”的内在含义是：大学的主要使命就是通过完善学者社群的文化生活来培养学生的整全人格，本科教育的价值也不在于掌握各个学科的散碎知识；“我们应当追求的，与其说是知识的获取，不如说是求知的精神。”^①大学所应提供的，不仅是教室和实验室，更应是整体的社群生活和个体的发展平台。为此，美国大学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生与教师、社会的内在联系，使其拥有反思能力和创造精神，助其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完整。

“全人教育”理念提出后，迅速得到了热烈回应。在支持者看来，“全人教育”不仅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学专业化和功利化的深刻批判，更是在立足美国社会、反思历史发展的前提下，博采众家之长、独具美国特色的新理念。“全人教育”的提出，主要与当时美国大学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严厉批判，批评者认为，其目标过于空洞、气氛过于冷漠、课程过于专化。对此“全人教育”者提出：“个体的成长必须与群体同呼吸，与社会共命运，大学绝不能培养孤独、自私、狡猾的利己主义者。”^②因此，他们主张打破社会阶层和地域出身的限制，为广大学生构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培养拥有共同文化身份和生活经历的国家精英。为重建大学文化共同体，“全人教育”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

① Wilson, Woodrow, “The Spirit of Learning”,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 1909: 1-17. 9-10.

② Alex Duke,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2.

革措施,其中最核心的措施,就是学习牛津和剑桥,创建住宿书院教育模式。住宿书院缘起于中世纪的巴黎,盛行于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其特色在于注重文化生活,提倡师生共处、民主自治和社群协作。鉴于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渊源以及英式教育传统的独特魅力,“全人教育”者决心模仿英式书院,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创办学舍。经过长期的谋划,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期开启了美国大学史上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书院建造运动,其主要在两个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其一,以当时盛行的“哥特文化复兴”运动为契机设计大学建筑景观,营造整体的文化氛围。“哥特文化复兴”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早期旨在抵制当时风靡欧洲的新古典建筑,复兴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场旨在全面弘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在文学、美学、爱国主义和伦理道德等多个向度同时展开的文化运动。”^①哥特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英国社会具有连贯而整全的文化传统,而哥特式建筑风格就是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19世纪末,哥特复兴运动在英国已是强弩之末,而正被功利主义思想所充斥的美国大学却重新发现了其独特魅力,视为纠正拜物主义的一剂良方。于是从19世纪末期肇始,一大批美国高校纷纷依照哥特式风格对原有的建筑进行外观改造,同时建造新的住宿书院。至1930年,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等代表性学校的书院群落次第竣工,哥特式的校园外观也基本成型。哈佛诸学舍皆分布在查尔斯河两岸,均以本校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名,落成后立即成为校园文化景观的集中代表。普林斯顿大学的书院建筑宏大壮丽,该校研究生院院长安德鲁·韦斯特曾由衷感叹:“明媚的阳光将书院方庭的轮廓勾勒在草坪上,塔楼高高矗立,条条幽径通往宁静的寓所,

^① Clark, Kenneth, *The Gothic Revival: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aste* [M]. New York: Scribners, 1950:301.

爬满常青藤的外墙正对着精心修剪的花园……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思绪满怀，万千追忆像墙上密布的常青藤一样生长；建筑和景观为何值得关注？因为它能勾起我们对大学文化的历史追忆。”^①

其二，将本科学生集中到书院当中，为校园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大众参与者，全面丰富了大学文化生活。住宿书院落成后，美国大学成功地将寄宿生活和智识发展融为一炉。学生们从此拥有了一个与教师和同伴充分互动的交流平台，不用再一味费尽心思地加入俱乐部、兄弟会等具有排他性和娱乐性特质的学生社团。简而言之，住宿书院的落成让大学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和团结。有学者认为，书院体制的引入对美国大学的最大影响，就是用宽广厚重的知识追求和连贯凝聚的社群生活，取代了原本自私褊狭的个人主义风格。^② 哈佛大学的《1949 年校长报告》曾公开表示，书院体系使本校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文化传统的大学——一个学者和导师栖居一堂，共同砥砺学问、享用美食、虔诚祈祷和休闲娱乐的文化共同体”。

在住宿书院体系的配合下，“全人教育”者还完成了大学课程的改革。“美国大学生应当接触更多领域的知识，做一个博学多闻之人；尤其在当下社会，大家皆孜孜以求关乎职业发展的专门学问，博闻强识已成为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因此，对于美国大学生而言，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既选择一个主修专业深入钻研，同时也在相关领域选修一系列通识课程……学生并不一定需要深入研究其他专业，但却应当能够对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

① Turner Paul Venable. *Campus: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227-233.

② Fraser, Mowat G, *The Colleges of the Future: An Appraisal of Fundamental Plans and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7.

和思维方式有所理解。”^①这段话集中概括了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专精”与“博约”并重,既强调专业深度,又注重宽广根基。为具体实现这一目标,洛厄尔提倡“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要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则由学生自由选择。^②从1914年开始,哈佛正式实行“集中与分配”的课程体系,之后迅速被其他大学所仿效,并逐渐发展成全美通行的核心课程体系。

为了配合新的课程体系,“全人教育”者还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哈佛不仅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开设通识课程,而且要求通识教育课程的承担者必须是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关于基础理论的传授,却只有那些站在树冠之上俯瞰整片森林的资深教师才能展开深入浅出的透彻解读。从事基础理论教育之人不仅必须拥有异乎常人的清晰思维,同时还要具备铿锵有力的讲解论述,以及循循善诱的教育热忱。”^③为了减轻主讲教授的负担,哈佛还专门为通识课程配备了助教,由他们协助主讲教授进行补充教学以及经常性地开展小组讨论和测试。如此一来,不仅所有学生在入门阶段就能获得思维强健、学问成熟的名师指导,而且教授们也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省去了许多麻烦。

书院模式的引入再次体现了美国大学的学习传统和改革精神。学习世界先进大学的优秀经验是崛起中的大学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但在此过程中要注重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连续性;二是全面性。所谓连续性,指的是自有大学8个世纪以来的主体

① Lowell. Abbot Lawrence, *At War with Academic Traditions in America*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274.

② 徐志强. 阿伯特·洛厄尔对哈佛大学的改革及启示[J]. 现代大学教育. 2015(2): 34.

③ Lowell. Abbot Lawrence, *At War with Academic Traditions in America*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274.

教育功能需要被传承，不能因学术创新和服务社会而有所削弱。所谓全面性，是指学习对象不可以偏概全。自有哈佛以来将近400年，美国大学至少体现了3种不同类型的历史经验：首先是在殖民地时期源自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宗教虔敬气质和经典教育课程，历史渊薮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其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现代研究型大学，以知识创新为鹄的，崇尚自由和寂寞；再次是国教改革之后的英国古典大学，以牛津、剑桥大学为代表，提倡培养人格完善的绅士学者和社会领袖。而这三种理念皆是大学的核心要义，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学都或多或少地对其有所继承和发扬。

不过，经验可以借鉴，制度可以学习，但是文化生活却无法进行简单的复制或移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学习他者只是手段，自我完善和超越才是目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确能够提高效率、缩短过程，但却无法指明方向，无法解决个体和社会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的根本诉求。文化生活和精神理念才是生发伟大大学、锻造伟大社会的根本动力。通过学习德国，美国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引入书院模式，美国大学焕新了教育理念，繁荣了文化生活。从此以后，美国大学不仅以技术和知识服务社会，更力图在“全人教育”理念下培养“美国公民”和“美国伟大学者”，以促进社会健康、改善社会品性。今日同样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大学，理应从中获得启迪。

邓磊

2017.4

致 谢

这部著作的撰写使我进一步加强了一个学术研究方面的信念：没有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或者至少是没有任何一项优秀的学术研究，是完全可以独自开展的。如果本书的写作质量能够得到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各位同侪的帮助，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私人层面，笔者都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

首先要感谢的是 William Reese，在他的指导下，印第安纳大学学术论文指导委员会不仅助我发起了这项研究，而且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整个书稿的撰写。Bill（即 William 的昵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整个文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总是用热情洋溢的态度向我细致地讲解自己的意见，鼓励我继续努力。我还要感谢本人学术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其他成员——George Kuh, Jeanne Peterson 和 Philip Chamberlain，他们都殷切关注我的学术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建设性意见。与此同时，我的诸位同事也在论文写作期间阅读和评论了部分内容，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Harold Silver 在印第安纳州巡回授课期间拨冗阅读和评论了三章内容；Ed McClellan, Robert Schwartz, Amy Schutt, Ted Stahley, Dick Rubinger, Ed Beauchamp 和 Don Earren 等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也阅读了部分文稿，并且给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意见。Elizabeth Whitt 针对整部书稿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对此我必须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印第安纳大学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该校贝希勒奖学金（Beechler scholarship）和研究生院资助中心的支持，本研究才得以顺利进行。

在此我还要对几位导师进行特别感谢，他们长期给予我支持和指导，无论我何时请教。这几位导师分别是艾伦·舍尔（Allen Sholl）、芭芭拉·库珀（Barbara Cooper）、默纳·济夫（Myrna Ziff）、斯蒂芬·奥尔特（Steven Ort）、肯尼斯·坎普（Kenneth Kamp）和赫尔曼·杰（Herman Jay）。

特别致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格蕾迪斯·托普基斯（Gladys Topkis）和海蒂·唐尼（Heidi Downey），他们给予了我许多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最感激的还是我的父母，他们在我求学与写作期间给予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最大关怀。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父亲已经无法看到这部著作的完成，我将此书献给他。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鼓励，以及他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信心，将陪伴我度过一生。

导 言

自美国现代大学在 19 世纪晚期诞生之日起,教育学家曾多次质疑把学生和教师相割裂的做法。伴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及教师群体以研究为中心的趋势不断增强,师生关系的疏离日益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特有现象,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大学曾尝试着采取多种手段和策略,其中最具雄心壮志的举措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住宿书院(residential college),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个课堂之外的学习交流场所。^①总体而言,美国大学的上述举措基本上都普遍借鉴了英国牛津大学的住宿书院制度,个别大学则尤其关注剑桥大学的住宿书院制度。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哈佛大学部分教师和校友建议效仿当时如日中天的牛津书院制,围绕小规模的学生和教师社群重组本科教学机构,但这一建议未得到时任校长查理·艾略特等主要领导的支持。相比之下,另外两位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

^① 与高等教育领域的“校长”(chancellor)、学院或书院(college)以及“大学”(university)等定义并不十分明确的概念一样,“住宿书院”(residential college)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此概念可以适用于任何具有学生住宿功能的高等教学机构。为了明确此概念在本书中的含义,笔者专门对其作出的解释是:在牛津和剑桥(简称“牛桥”或“牛剑”,即“Oxford and Cambridge”的缩写“Oxbridge”)两所英国古典大学的教学模式影响下,以整合师生的知识探究和社会生活为目的,具备住宿功能的二级大学部门。——译者注

的威廉·雷尼·哈珀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则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大学实施这项住宿书院计划。但是，这两位校长最终也未能亲手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1902年，哈珀校长建议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下放到八个方形庭院（quadrangle）中集中开展，每个方庭都应当拥有专属自己的教师、学生和寝舍。但由于哈珀在1905年的骤然离世，这项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1906年，威尔逊校长曾试图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食堂改建为牛津模式的住宿书院，但却遭到全体教员激烈反对，最终这一计划被校董会取消。

尽管屡屡受挫，但美国大学对于引入英式住宿书院的热情却一直未曾消退。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波莫纳学院终于开始正式创建牛津式的寄宿书院。在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的经费支持下，哈佛和耶鲁着手建立具有牛津气质的学生寄宿体系，分别成立了一系列的寄宿式学舍（houses）和书院（colleges）。几乎与此同时，波莫纳学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既有的统一教学和住宿组织方式之外，发展一套具有自治性质的住宿书院体系，从而为学生提供常规体制之外的不同教育路径。通过实施上述举措，波莫纳学院期望自己能在规模扩大和职能增多的情形下，依然能够保持小型书院的教学风格。1926年，随着斯克利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的创办，克莱蒙特联盟（Claremont Colleges）正式成立，并在不久之后进一步发展为拥有五个本科生院和一个研究生院的院校联合体。^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大学住宿书院体系的发展乏善可陈。但不久后的20世纪60年代，却又掀起了一场建院理念复兴运动。在此期间，全美至少新建了44所住宿书院。1968年，

① See Bragdon, Woodrow Wilson: The Academic Years; Craig, Woodrow Wilson at Princeton; Storr, Harper's University: The Beginning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ergin, Yale's Residential Colleges; Jencks and Riesman,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Education". Also see Bernard, Unfinished Dream; Clary, Claremont Colleges; Lyon, History of Pomona College.

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导者召开了一场全国会议,首次提出了“集群书院”[或“群聚书院(cluster college)"]理念,并对其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根据杰里·R. 加夫(Jerry R. Gaff)的解读,尽管集群书院计划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创性,但该理念的提出主要还是“对宝贵庄严的牛津、剑桥书院结构的重新阐释”^①。1966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成立,加州高等教育体系内首次有一所学校将住宿书院当做最主要的教学组织形式,这一事件堪称集群书院创建运动过程中最具开创性的举措。尽管圣克鲁兹分校最终也将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组织使命,但大致而言其整体规划还是如实反映了克拉克·克尔校长将发展本科教育作为大学核心根基的设想。根据克尔的意见,英国大学的组织模式已经将本科教育提升到一个无可匹敌的高度,而圣克鲁兹分校所体现的办学思想,就是以英国大学为蓝本提升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从筹建计划来看,英国大学对圣克鲁兹校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建立一系列的学生宿舍,而是体现在全盘的建校计划当中。这所新创建的学校旨在为全体成员提供统一的学习平台,基于这个平台,全校层面的学科课程能够协调开展。教职员工不仅能在学术领域进行交流互动,而且会将住宿书院视作开展各项活动的中心所在。该校的部分筹建者甚至还试图采用英国模式的本科学位综合考试制度。^②

上述计划的实施,皆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一系列戏剧性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完成的。自1860年以降,当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大学校友重返母校时,总会发觉眼前看到的这所校园与记忆中的求学场景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偏差。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学生人数的增多。众所周知,由于1944年退伍军人权

① Gaff, “Cluster College Concept”, pp. 16-17, p. 9.

② See McHenry, “Academic Organizational Marrlx at Santa Cruz”; Vonder Muh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D. Davis, “Cluster College Revisited”.